



习语回响

●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

●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

●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文/本报记者 张丽
■图/受访者提供

开展科学考古，用实证与研究凝聚共识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作为牵头单位，组织相关科研人员，分阶段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目前研究已进入第五阶段，作为该阶段的负责人，请您讲讲该阶段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与研究达成共识？

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来自国内外70多家科研单位的约400位专家参与了研究，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有关古代文明的大型综合研究项目。研究证实，从距今5300年前后开始，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渐次进入文明社会。各地区密切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史前史作用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项目第五阶段（2020—2024）开展以来，项目组不同团队持续围绕辽宁建平牛河梁、陕西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广汉三星堆等遗址开展系统的田野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年代学课题、古环境研究、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等课题取得重要收获，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宏大进程的认识。两年多的研究，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同时，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密切联系，交流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由此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绵不绝。

记者：您曾谈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田野考古工作为中心，以多学科联合攻关方式开展研究。作为亲历者，请谈谈在考古实践中，如何运用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址？

陈星灿：考古学本身就是一门多学科合作的科学，从勘探、发掘、资料提取到资料分析，都离不开自然科学。比如通过植硅石分析、淀粉粒分析等研究古代人类的生业、气候与环境，利用骨骼中的同位素分析技术检测分析古人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等。

当下很多最新技术都运用到了考古学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亦然。比如项目组使用多种分析检测手段，与碳十四测年相结合，采用贝叶斯统计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测年结果进行分析，综合分析考古遗存年代，对重点遗址的关键时间节点探索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石峁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测年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掘多重价值，探寻中华文明清晰图景

记者：在进一步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同时，如何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

筑中华文化根基 展中华文明风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访谈

202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考古印证历史，也带来新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十年来始终致力于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与其他考古学者一道，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揭开一个个历史之谜，让考古工作成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对于考古人来说，前面永远都有下一个新发现。”陈星灿说。



陈星灿(右三)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考察 (资料图)

委员简介

陈星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明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陈星灿：近年来，随着文物活起来，我们逐渐意识到活起来的不仅是出土文物，还包括出土遗址。加强出土文物和遗址保护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遗址发掘时，增强了保护意识，不仅考虑它的研究价值，也考虑它的展示利用价值。

学术研究也不能脱离公众，公众需要得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曾以考古新发现为主要内容，在多地举办过多次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还有新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利用最新成果推进夏文化研究的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考古研究所还与央视等媒体合作《考古进行时》等科普纪录片，让考古走进大众视野，走近人们生活。

至于如何进一步做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利用、宣传和普及工作，我以前也多次谈到，希望能将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新发现、新认识及时输入教材，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年轻一代对祖国历史的认同感；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览、纪录片、短视频等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做中华文明探源之前，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两个项目为例，如何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陈星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启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告一段落。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利用多学科合作的方法，研究分析夏、商、周三朝的年代。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建立不同课题，考古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等一道努力，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年表。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向前追溯，其目的就是弄清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两个项目具有连续性又彼此独立，两者之间的过渡是考古研究的自然延伸。

记者：怎样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陈星灿：虽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始于2002年，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早在考古学成立那一天，从1921年考古学者发掘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时就已经开始了。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是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仰韶文化刚开始发现时，“中国东西来说”较为流行，因为考古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出土的彩陶非常相似。到了20世

纪三十年代，随着山东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考古学者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50年代以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逐渐被理清，并在六十年代逐渐形成从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夏商周的“一元论”。到70年代以后，黄河下游、上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地区等陆续发现长期的文化演变历史，其连续发展的脉络清楚，时代也不比中原地区晚，所以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逐渐代替一元论，特别是在费孝通、苏秉琦、夏鼐等考古学家的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应运而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然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的总框架下开展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大框架下“打转转”止步不前，而是让其中的细节、过程更为清楚与透彻。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前，划分中国史前文化区域时，一般并不包括长江上游。随着三星堆和川西北、四川盆地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现在知道其中有些文化因素是在五六千年前通过西北甘青地区进入川西北地区，再从川西北地区传入四川盆地，从而扩充了中国史前文化区域的版图。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在互相碰撞中逐渐融合，最终演化为我们熟知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演进的脉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过，中华文明演化的轨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虽然还有很多空白，还有很多地方模糊不清，但我坚

信，未来的考古发现与考古研究，一定会让历史更清晰、更充实。

探索历史未知，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

记者：您不仅从事考古学研究，也从考古学教育，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有哪些思考与探索？

陈星灿：考古学本身是个小学科，但承载着大使命。这就导致一方面考古学相关岗位较少，无法承载太多人才；另一方面，诸多亟待保护的遗址遗迹和重大的学术问题，呼唤着更多考古人才。

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点在于，它具有一种紧迫感，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不断被盗掘或毁坏，亟须好好保护起来。否则当我们或后人想要发掘时，可能已被破坏殆尽。因此，这种紧迫感并不在于一定要尽快把遗址挖掘出来，而是要把遗址好好保护起来，然后循序渐进地发掘和研究。

记者：从事考古学研究与实践数十年来，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瞬间？

陈星灿：具体到某件事或某个瞬间，我无法言说，因为考古学本身处处充满魅力。虽然好似每天都在重复发掘，但在遗迹、遗物被发掘出土之前，我们永远不知道还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始终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具有浪漫气质的科学。其浪漫的气质，就在于那对于未知的发掘与发现。也许你前一天还在垂头丧气，第二天就已发掘出惊喜，甚至是足够改写历史的惊喜。三星堆遗址不就是这样吗？本来是基建考古，忽然发掘出一坑足以石破天惊的象牙、金器、青铜器等等，从此历史在这里发生改变。

记者：您曾在一个演讲中谈到百年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相较而言，新时代的考古学有哪些新发展新特色？在您看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应该怎么做？

陈星灿：就它的学术属性来说，考古学跟物理学、化学等也没有太多区别，但它毕竟还是一种人文科学，因此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二十五史等历史文献，记载的多是政治史，是王朝更替，对古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物质生活鲜少记载。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考古学在过去百年来重写了一部中国史，起码重写了一部中国史前史。即便是主要由文献搭建起来的历史时期的历史，考古学家也作了很多贡献。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了诸多变化，可以概括为科学化、大众化与国际化。科学化，主要体现在多学科合作在考古学应用中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充分。大众化，主要体现在遗址、遗物的保护、展示与利用，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大众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心出土遗址、遗物的保护和利用。国际化，主要体现在随着考古力量、力度的不断加大，海外考古逐渐兴起。研究人类文化，不仅要研究自己，还要研究他人，并且通过研究其他文明加深对自身文明的研究。通过海外考古的不断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日益开阔，对外交流日益加深，这都与我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密不可分。考古工作，其实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随着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方面的进步，以及中国考古学日益开放的步伐，用中国的考古材料重建有血肉的中国古代历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应有的贡献。

记者手记

“热”起来，还要“冷”下去

本报记者 张丽

全国两会前，陈星灿委员刚刚忙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招聘工作。考古学新鲜血液的注入，让接受采访时他，疲惫中带着欣喜。他告诉记者，今年考古研究所聘用了33人，所学专业涵盖史前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等多个门类。他能明显感受到，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热爱与投身考古事业，考古队伍在逐渐扩大。

而在几天前的2月22日，考古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最新发布了包括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内的6项入选项目，引起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六大发现”也将这些新发现的遗址推向公众视野。“热”的背后，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公众的眼光与步伐开始投向博物馆、考古遗址等精神殿堂。

但考古学的使命是严肃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100多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取得，离不开“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新时代考古工作者更是重任在肩：“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共同关注

陈红彦委员：培根铸魂，坚定文化自信

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中，3000多年前的甲骨、金石拓片等，成为近年来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研究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向记者历数国家图书馆近年来的部分相关学术成果：陆续发布馆藏甲骨文数据，整理出版提供学界研究，已经出版《国家图书馆青铜器全形拓集成》，陆续出版《敦煌遗书书法精选集》，正在编纂即将出版的《国家图书馆甲骨文全集》《国家图书馆藏金文全集》……

不仅如此，在对出土文物、文字的阐释展示上，通过陈红彦的介绍还可以获知，除了出版、数字化、展览、影视甚至游戏、有效传承。“国家图书馆近期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甲骨展吸引着中外参观者，其中一个‘阅字如愿’网络互动小游戏更是让看似陌生的甲骨文赢得了2.15亿曝光量，从象牙塔走进青少年的生活。”

陈红彦说，她专门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寻找到自己从事工作领域的关键词——全民阅读、公共图书馆、优秀传统文化、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智库、国际传播和科普……履职和本职工作的有效衔接，职业和国家要求的高度契合，让作为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她荣幸与欣慰于能将个人努力融入国家文化发展，以更好地履行好培根铸魂、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呈现曾经的中国创造，结合现在的需求进行技术创新，构成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这是古籍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陈红彦说道。（张丽）

们发延委员：守住中华文化的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博领域研究与实践的全国政协委员，民族文化官副主任、研究员们发延深有感触。特别是文物、古籍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时代意义。如何研究好、阐释好、展示好这些“国宝”，成为他始终思考与探索的课题。

近年来，他参与策划推出“文物有话说”专栏，用民族文化官馆藏文物古籍讲述中国故事；“让古籍活起来”专栏，用古籍讲述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的发展历程和“四个共同”的精彩故事；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举办系列展览，用文物古籍展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断。“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我们有责任守住中华文化的根，把根深叶茂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们发延说道。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他期待更多的文物、遗产、文字在文博工作者的参与中活起来，不仅在中国的舞台上，也在世界的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期待自己能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应有的力量。（张丽）